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重点图书

著名学者回首

百年邓小平

郑苏龚邢杨逢冷石刘汝吴侯
必育贲春先仲国树树
坚星之思贵知溶泉光信青栋

百年邓小平

坚星之思贵知溶泉光信青栋
必育贵春先仲国
郑苏龚邢杨逢冷石刘汝吴侯树树

著名学者回首

出版说明

为隆重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我们精心组织出版了《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一书。本书约请的 12 位作者均是著名的理论家，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龚育之、邢贲思、杨春贵；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冷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约顾问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这些专家学者撰写的纪念文章，有珍贵的史料记载，有独特的历史审视，有深刻的理论阐发，对我们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铭记这位世纪伟人对历史的贡献，继承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极具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在此，我们谨对上述 12 位著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谢意！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八月

目录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 郑必坚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第三卷的一点回忆/1
- 苏 星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4
- 龚育之 独特的超越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26
- 邢贲思 百年沧桑话巨变/40
- 杨春贵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精髓和首要问题/57
- 逄先知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5

著名学者回首百年邓小平

- 冷 溶**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 126
- 石仲泉**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形态 / 139
- 刘国光** 超越传统 开拓新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 / 165
- 汝 信**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发展生产力 / 183
- 吴树青** 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伟大成果 / 205
- 侯树栋**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248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 编邓选第三卷的 一点回忆

□ 郑必坚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深情地想起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情景。

有幸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回忆起来确实有特殊的亲切感。很兴奋，又很严肃，富有教益。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却仍然新鲜如昨。

我这里只就小平同志本人是怎样评价邓选第三卷的，作一点回忆。小平同志自己的评价，就体现在他指导编邓选第三卷时说过的许多意见当

中。这些意见言简意赅，但是涉及总体评价，寓意深刻，对深入把握邓选第三卷具有重要意义，使我深受教育。仅举三例。

头一个例子，关于邓选第三卷的开卷篇和终卷篇的确定。十二大开幕词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同意把这一篇移过来，作为第三卷的开卷篇，这实质上是鲜明地提示了第三卷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这一卷所反映的，是在我们党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阶段上，小平同志的理论和战略思考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至于第三卷的终卷篇确定为南方谈话，也有重要涵义。这篇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正如十五大所指出，南方谈话，是继小平同志1978年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之后的，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实际上，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之后还曾有几次重要谈话并已公开报道，这个情况我们向他报告了；但他经过考虑，还是确定：“编到南方谈话为止”，并且说：“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所以，第三卷的这一头一尾的确定，非同寻常，应当说是表达了小平同志本人对第三卷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

第二个例子，小平同志说：在邓选第三卷里，“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来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小平同志这段话，实质上可以说是从战略思维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对邓选第三卷的重要评价。通观第三卷，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一定要着眼大局。什么大局呢？两个大局：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从国际大局的分析，得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

代世界真正大的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从国内大局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两方面的分析当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关于这两个大局的分析的基础上，小平同志大大深化了关于抓住机遇的战略思想，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又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鲜明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并且在1990年4月同外宾谈话时鲜明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可见这个大局观念，贯穿理论和战略，贯穿对内和对外，贯穿对现在和对未来，真正是贯穿全篇啊！

我还有这样一点体会，小平同志关于不是从小的角度而是从大局着眼的提示，实际上是他毕生立身行事和精神境界的一个提炼和概括，一个极朴实极深刻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提炼和概括。

第三个例子，小平同志还说：邓选第三卷，“教育人民，正好用得着”，“这实际上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我们大家都会清楚理解，小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卷，中心意思就在这里。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第三卷的亲历，还使我想起，像小平同志这样一位代表了时代的伟大人物，以八十九岁的高龄，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过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的理论著作，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这种情形，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罕见的吧！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 奠基人

□ 苏 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是过去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辞典里都不曾出现过的。这一理论，20世纪产生于社会主义中国，它的奠基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理论来源于实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逐步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

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学的是苏联当时计划工作的经验。苏联计划体制的特点是，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计划一直管到企业和集体农庄，否认市场的作用。“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① 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几年，这个管理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原因是，那时国民经济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其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数量众多的国有和公私合营的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和手工业，也依存于市场，对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实行计划直接管理。当时，只对一部分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央和省市管理的企业）和大型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其余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集体农业和手工业是实行间接计划；对私营企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则通过加工订货、预购合同、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一时期，我们不仅没有排斥市场的作用，相反地，曾经广泛地利用市场和市场调节，来调整资源分配和改善经济管理。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的是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什么当时经济生活并不那么僵化，市场还比较繁荣？从这里，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

在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体系出现问题，是在对生产资料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35 页。

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时，适应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国有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普遍出现了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经济效益下降的情况。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主张，应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市场调节的措施，并且从理论上概括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要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① 这些主张，当时已被党的八大所接受。

陈云的上述设想，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找到了一条利用市场调节的新的途径。这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是新的重大的贡献。可惜的是，这些设想并未付诸实施。由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路线，实行了一套“左”的政策，这些都被 1958 年的“大跃进”吹掉了。

从 1958 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 20 年，由于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盛行，计划被打乱了，市场调节则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批判。在此期间，经济上当然也取得若干成就，但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对这一段历史，邓小平曾作过深刻的反思。1987 年 6 月，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

^①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13 页。

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由于它把“左”的路线推向极端，又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邓小平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革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②

正是基于这一正确认识，邓小平在1975年恢复工作以后，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立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224页。

1987年，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些改革开放的设想，很快被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所否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变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广大群众的实践。

—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农村突破的。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了克服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中共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已经开始放宽政策，并抵制一些“左”的做法（如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已经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高级合作化时就出现了。但一直被当做“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政干部从上到下对此都比较小心谨慎，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

是农民群众悄悄地搞起来的。1978年冬开始，安徽省的一些地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著名的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就是在此间出现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不同，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取得，不再采用工分分配形式。农民群众把它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这种形式利益更直接、责任更明确、方法更简便，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大包干”发展很快，效果也立竿见影。但有许多人反对，说这是“分田单干”，是“倒退”，会破坏集体经济。针对这些反对意见，1980年5月，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① 这是对包产到户极为有力的支持。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座谈会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当时，中国农村大多数是贫困落后的。因此，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包产到户、“大包干”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展很快，到1990年底，已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上升到14.9%。1981年下半年以后，包产到户、“大包干”便遍及全国，不仅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富裕和比较富裕的社队也纷纷实行，而且大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92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占86.7%。1983年初，已占93%，其中绝大部分是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冲破了严重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了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新的管理体制。新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①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这包括：肯定专业户（重点户）；对雇工经营作了规定；允许农民购置农机具；发展个体商业和服务业，允许农民长途贩运；鼓励农民个人或合伙集资兴办基础设施。1984年，中央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1985年，粮食、棉花取消统购，定购以外的可以自由上市。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这是一项重大改革，邓小平称赞这是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②

早在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5年6月，全国完成了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②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5页。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它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 20 年，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 20 年。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已经从总体上进入小康阶段。

我国的城市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生产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配；财务统收统支，资金由国家拨，利润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客观要求。

1978 年第四季度，四川省在江宁机械厂等六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到显著效果。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到 1980 年 6 月，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 6600 个。1980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六千多个。这些单位的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怎样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开始找到了门路。”^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采用过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经营承包责任制、股份制试点……变来变去，都是为了更好地把三者的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1992 年 10 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党的十四大的精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2 页。

神，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才走上比较规范的路子。

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市场经济塑造了微观主体，宏观改革是从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开始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极不合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价格基本冻结，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态。这种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不仅不利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非进行改革不可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指出，应当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会议还建议，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出厂价和销售价。这表明，党中央已开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价格改革是1979年开始的。1979年到1984年的做法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调，就是在不变更原有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条件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活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价格改革的重点便进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阶段，办法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1985年和1986年这两年，我国的价格改革取得了实质性